

煤化工“大跃进”遭遇宏观调控,近九成项目面临出局

投资拉动:机制亟待改革

很多过剩的问题,其实就是本地的规划和国家不统一的问题,地方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不协调,国家的产业政策还需要制订得细一些,对每个地方要是能有明确的引导,才不会导致各地一哄而上。

■ 本报记者 张龙

7月6日,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指导和规范“十二五”时期煤化工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煤炭深加工示范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已经下发到各省,将于近期颁布。该规划在全国确定了15个示范项目。

中讯化工信息研究院的专家表示,《规划》中“深加工”和“示范”等措辞都显示了决策层对煤化工发展更为审慎,而仅15个项目获批明显低于分析人士预测。《规划》对示范项目提出了先进的能效、煤耗水耗等准入指标和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确定了7大类共17项技术装备方面的重点示范内容,引导企业和地方政府在提高能效和附加值、降低污染物排放、加强系统优化集成以及探索模式创新等方面进行示范。

在国家规划如此严厉的背后,却是地方政府对于煤化工超高的热情。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司长李治近日公开表示:“截至目前,国家发改委收到的各地发改委通过官方途径正式上报的有104个大型煤化工项目,投资额已经高达2万亿元,这些项目都申请在‘十二五’期间开工建设,显然是不可能的。”

煤炭行业自身持续的低迷或许助长了煤化工的“疯狂”。河北一家焦炭厂负责人马顺利告诉记者:“焦煤、焦炭企业形势很不好,一些钢厂甚至停止了采购焦炭,二级冶金焦炭甚至有厂家报价低至每吨不到1700元,再这样下去就该停产了。”此外,上周秦皇岛挂牌煤价再次大幅下行,每吨跌幅达到25至35元。

被“点燃”的煤化工

地方政府对于发展煤化工的热情空前高涨。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多次出手抑制煤化工,但煤化工火热发展势头始终未见“退烧”,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主产区纷纷提出“十二五”期间将大力发展现代煤化工产业,山西和内蒙古更是将煤化工产业作为煤炭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此次《规划》中,记者注意到,15个示范项目中,分布在9个省及自治区,均为中西部地区,内蒙古和新疆两地的项目数量占15个项目的近半数。

在上述《规划》之前,去年4月,国家发改委就发布了《关于规范煤化工产业有序发展的通知》,对投资严重过剩的煤化工紧急叫停。

其实早在2010年6月,国家发改委收回煤化工项目审批权之前,只有大唐辽宁阜新制煤制气项目、大唐克什腾制煤制气项目、神华内蒙古鄂尔多斯制煤制气项目和新疆庆华制煤制气项目4个项目获得建设许可。

现在却达到了104个。

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出台的政策,始终未能让煤化工“冷静”下来。

事实上,早在2011年上半年,全国在建和拟建的煤制油项目产能多达4000万吨,煤制烯烃产能达2800万吨,煤制天然气产能接近1500亿



2011年上半年,全国在建和拟建的煤制油项目产能多达4000万吨,煤制烯烃产能达2800万吨,煤制天然气产能接近1500亿立方米,煤制乙二醇产能超过500万吨。各项目产能之和远远超过需求。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立方米,煤制乙二醇产能超过500万吨。各项目产能之和远远超过需求。产能过剩已经一年多多了。

“不少地方政府都把煤化工写入

了‘十二五’规划,政策上是非常支持的,尽管目前看煤化工盈利状况并不好。”内蒙古一家煤化工企业的中层告诉记者。

国家能源局有关人士称,“十二五”时期仍不具备大规模发展现代煤化工产业的客观条件,迫切需要技术创新,继续开展更高层次的示范,来提高资源的利用水平。

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周修杰也指出,目前国内试点的煤制甲醇、煤制烯烃、煤制油等新型煤化工项目的碳转化率一般在40%上下,60%的碳则转化为二氧化碳碳排放出去。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告诉记者,自2009年煤炭行业整合以来,很多大型煤企获得了大量的煤炭资源,继而集体涌入煤化工,期望转型,导致煤化工热度持续上升。但由于不少企业技术并不过硬,使得煤化工在技术上裹足不前,同时污染了当地的环境。但由于手里的煤炭资源成本低,很多企业并不愿意放手这一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的行业。

“保增长”下被放大的重复投资

在“保增长”的现实压力下,地方政府重新拾起了投资拉动的“老办法”。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我们下去调研也会经常碰到这个问题。但这个方法确实见效快,但容易在短时期内形成大量的重复投资,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经常与国家规划相悖。现在只要是国家要重点发展的行业,地方政府就会蜂拥而上。”上述不愿具名的专家说。

作为地方国企的负责人,马顺利告诉记者,地方政府也有苦衷,煤化工、钢铁、水泥,甚至一些新能源等过

剩行业,很多都是地方的优势产业,但是很多地方的优势都是相同的,国家政策要是大量限制,地方政府的发展就需要另辟蹊径,这确实很难。

“我在基层工作20多年了,很多过剩的问题,其实就是本地的规划和国家不统一的问题,地方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不协调,国家的产业政策还需要制订得细一些,对每个地方要是能有明确的引导,才不会导致各地一哄而上。”马顺利说。

在行业发展不控制的情况下,盲目上大规模项目和重复的投资,让马顺利感受颇深。

“钢铁行业赚钱的时候,焦炭行情也跟着好,焦炭价格最高有3000

多元每吨,后来进入到这个行业的企业越来越多,造成了焦炭行业产能过剩,现在价格才1000多元每吨。”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来楠曾公开表示,中国对投资的过度依赖不仅会给经济转型带来困扰,也会造成巨大的风险隐患和潜在危机。要弱化政府投资倾向,特别是对银行输血的投资体制进行改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喊了很多年,现在投资驱动下的中国是到了该作出重大调整的时候了。

上述不愿具名的专家称,未来要以消费为主导。投资方面,国家侧重于有利于转型的投资,要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到这样的投资中。

快评

根治一哄而上的投资饥渴症

■ 胡海燕

104个大型煤化工项目,却只有15张通行证。煤化工领域的投资盲目是当下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当前我国经济处于下降通道的背景下,投资的意义尤其凸显。但是,单纯为了拉动经济增长而忽略了投资的风险,就会步入投资饥渴症的误区。

匈牙利大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早就批评过,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省长、市长、总经理、厂长,甚至一家医院院长、一所学校校长都有强烈的投资需求及投资饥渴症。因为他们无需像西方国家资本家那样承担投资一旦失败而必须还债、自杀等风险,却可以获得投资的巨大好处。他尖锐地指出,没有一个企业或非营利机构不想得到投资,不存在饱和问题;投资饥渴是长期的,假如刚刚完成的一项投资暂时满足了投资饥渴,很快又会产生新的饥

渴,而且比以前更为强烈。

在日前由中国投资联盟主办的中国国际投融资高峰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指出,当前企业投资首先要坚持长期运作,力戒急功近利,同时要慎重选择项目,防止草率决策。由于投资的风险甚大,所以风险投资家在投资项目时既要着项目也要看人。选择项目时要注意选择商业模式与众不同,技术基础比较成熟,市场前景相当广阔,经济效益估计切实,资金需求可能满足,技术定价合理适中,创业队伍结构整齐的项目。

形成良性的投资机制,必然要求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为的领域是市场失灵领域和体现政策导向的领域,包括促进技术创新、激励企业实现节能环保、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和项目以及维持项目运输和管理所必需的经费保障等方面;有所不为的领域是市场可以参与竞争的领域,如一般工程项目和服务的招投标等。

涪陵加油站新规:政府被指管理错位

(上接第一版)

上述负责人还为记者梳理了涪陵区加油站的发展历程,“最早的时候都是中石油的加油站,之后民营加油站开始出现。而在中石化加入后,民营加油站渐渐就开始向郊区发展。2005年前后,我们民营的加油站每个月还能从中石油或中石化拿到一些计划油,但都是很少量的,基本上一个加油站只能分到三五吨。而且是一个月内从中石油拿到计划油了,就不能再从中石化拿;从中石化拿到计划油了也就不能再在中石油拿到计划油。到现在,一点计划油都拿不到了,中石油或中石化说多少钱我们就得付多少钱。”

而对于涪陵区政府30年后将收回加油站经营权的做法,上述民营加油站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之前的做法虽然政府每年都需要对经营许可进行检验,但只要是安防、税务等相关条件合格,就会过关。而且在批给我们经营权的时候可没有说以后会收回去。”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政府的《办法》出台后也没有相关人来告知我,我也是听到业内人说起才得知的。”该负责人坦言,“不要说市区那些繁华地段,就以我们这些民营加油站所在的郊区来说,把土地、办证、建设成本加起来,一个加油站的投入要超过200万。如果30年之后政府真的要收回,很可能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并且之后的加油站经营权如果要招标的话,面对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巨头,我们民企肯定不占优势。”

一民营加油站经营者张修奎在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特许经营权收回后,政府对其进行公开拍卖,但民营加油站势力薄弱,很难与经济实力雄厚的中石油、中石化进行竞争,政府面向社会的招标,很有可能演变成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对手戏”。

另外一些民营加油站经营者表示,根据《办法》,“凡是以中石油、中石化等成品油专营中央企业为油源供应商的,需提供与其省级公司3年以上供油合同;使用其他油源的,需提供在重庆市范围内有自备油库且油源、油量有足够保证的证明。”这给民营加油站带来了难度。

对于《办法》发布后客观上造成的民营加油站的弱势地位,涪陵区商务局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加油站行业本身就不具备完全竞争性,带有一定的公益性,所以才实行特许经营,这就要求投资方要有一定的实力,从政府本身的用意来说绝对不会歧视民营加油站。

(上接第一版)

不过,孙立坚认为,降息仅仅再次释放央行稳增长的态度,至于是否见效关键还得取决于市场活力;即使再加大政府投资也是渠道有限,后遗症巨大。

“在目前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未来应给民企减税,降低其物流等运营成本,发挥其比较优势,而不能盲目促其调整结构。目前消费和服务占比的提高,不能乐观地认为是结构调整的效果,而应是增长放缓造成的后果。”孙立坚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著名财经评论家叶檀表示,此次降息具有明确的刺激实体经济投资、减轻负债者压力的特点。缩减了利息,央行之所以逼迫商业银行让利,主要是为了增加实体投资的力度。

解长痛还需调金融结构: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降息首日,不少银行的基准利率都已再度做出调整。几大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浮动幅度稍有不同。前者1年期存款利率上浮1.08倍,至3.25%,后者则选择了一浮到顶,均上调至基准利率的1.1倍,至3.3%。在存款利率下调的情况下,保证存款客户不流失成为各大银行的首要目标。

降息前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年度排行榜显示,2011年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几乎占全球银行业利润的1/3,以中国工商银行为首的3家中国银行占据了银行利润排行榜的前三位。

但事实上,进入2012年的半年来,银行业盈利已显著下降。中国银行业协会在降息前发布的报告预计,受到生息资产增长放缓、经济增速下行等因素影响,2012年银行业盈利增速会明显下滑,预计增速由2011年的39.3%降至16.12%。

这种趋势在郭田勇看来是再正常不过了。他说,银行业暴利时代慢慢终结,随之而来的是银行业包括整个金融业的调整和改革。

“实际利率差的收窄将促使商业银行降低对传统存贷款业务的依赖,增加中间业务的比例,以更好地适应进一步利率市场化改革。”郭田勇表示。

就在前不久结束的2012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中国经济中储蓄和投资结构严重失衡,中国金融业存在“两多两难问题”,企业多,融资难;资金多,投资难;不改善金融结构,中国经济将没有出路。

郭树清认为,中国经济中不仅储蓄和投资结构严重失衡,在国民经济的三次产业中,包括金融在内的整个第三产业发展不足,2011年第三产业仅占全部GDP的43%。这与发达国家73%左右、中等收入国家53%左右的比例差距不小,甚至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2008年世界平均水平是69%。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放缓的状态,下个月GDP可能会逼近警戒线。这在郭树清看来,非常正常。他说,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金融体系的改革和金融结构的调整至关重要。

郭田勇认为,稳妥推进金融改革的关键,应该借鉴国有银行改革的经验,成立多部门组成的国务院领导下的改革工作小组,设计改革总体方案,利益部门具体落实实施方案,做好三个方面的设计: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制度建设;按照市场化原则推进相关重大改革;加强金融管理,服务实体经济。

“两次降息凸显了我国未来继续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意图,也加快了改革的进程。而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是利率市场化顺利完成的前提。”郭田勇说,“因为改革必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就利率市场化而言,银行倒闭风险的增加以及随之产生的存款人利益受损将带来严重的损失。我国金融市场为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银行业总资产占整个金融业总资产的90%以上,因此银行业的风险将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重大波及。潜在风险的存在意味着利率市场化的顺利推进离不开监管的推进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

“从长期来看,利率市场化并不是简单的放开存贷款利率,更重要的是发展多层次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尤其是债券市场,通过债券市场形成的利率才是真正市场化的利率水平。”郭田勇进一步表示。

在历次紧缩放松的经济周期中,都不乏政府调控之手。在孙立坚看来,抗衡经济硬着陆的救市政策会重新造成“流动性泛滥”的后遗症,这个后遗症需要形成新一轮充满活力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才能加以吸收,这需要金融部门的大力支持。

“只有金融体系健全发展,才能化解全球资产价格大幅波动、融资环境日益恶化的金融风险,才能抗衡在阶段性的周期下行调整过程中投机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挤出效应。否则,改革开放30多年所积累起来的中国经济的硬实力会因为暂时性的周期调整而出现不可逆转的产业空心化趋势,甚至有可能落入当前学术界热议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孙立坚表示。

紫竹评论

“以医养医”才是医改终极方向

■ 丁是钉

作为解决“以药养医”问题的探路者,北京友谊医院试点两天让利37.9万元,有关方面表示,如果出现亏损政府则会兜底。如果说“以药养医”现象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那么切换到“以医养医”就是对的吗?国家会养得起吗?

医改的核心是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是,如果不改变老百姓“非名医、名院不去”的看病习惯,就是有再多优质的医疗资源,也无法满足其不断攀升的需求。因此,在现有医疗资源紧张的状况下,尤其需要通过市场手段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分层次地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为什么看病难?很多人都把“盘踞”北京各大医院的号贩子当做原因之一。但是,号贩子的存在并没有减少医疗资源,而只是改变了医疗资源的配置。事实上,号贩子的存在至少有两个积极的作用:一是标示了优质

医疗资源的市场价值,二是让更需要的人优先得到优质医疗资源。

对于看病这件事,特别是对于紧缺的“专家号”,排队挂号的做法看似公平,而实际上既不科学又不合理。原因就在于,那些有时间和精力排队的人,可能恰恰是病情并不紧急和严重的患者;而那些真的危重患者,则是没有可能等着通过排队来看病的。

要解决优质医疗资源短缺的唯一办法,就是大幅度提高其市场价格。我们注意到友谊医院在“医事费”这一制度设计中,已向向医疗费用的市场化方向迈出了一步。

提高优质医疗资源市场价格的重点应当放在解决“小病大治”等“过度医疗”问题上,以保障那些真正需要的患者能够优先并且低价地得到优质医疗资源。

目前,在北京这种医疗资源比较集中的城市,“小病大治”的现象非常普遍,有很多人即使是患了感冒,也非得去三甲医院挂专家门诊。对此,医疗管理部门应当立法治理“小

病大治”现象,对于存在“小病大治”问题的患者可以通过减少医保报销比例,直到完全自费不予报销的办法,减少对优质医疗资源过度使用的情况,保证优质医疗资源得到更合理的使用。

为什么看病贵?活跃在各大医院的医药代表的确是增加患者医疗成本的重要原因。这块成本的构成包括三部分:一是医药代表给医生的回扣;二是医生开大处方所造成“过度医疗”给患者增加的负担;三是医药代表及药商等相关利益者的不正当得利。

在这些成本中,真正而且必须防止发生的是后两项。正是因为医生,特别是高水平医生的价值被人为压低,才造成了医生群体不得不靠吃回扣和拿红包等途径来增加收入,这不仅是医生的耻辱,实质上也是全社会的耻辱。当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不能通过正当途径有尊严地拿到合理的报酬时,所有用道德来对其行为进行指责的声音都是无力的和不负责的。

的。

医生劳动价值被人为地压低,一方面把医生逼出了道德的底线,在医生中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导致患者对医生的尊重和信任减少,致使医患关系持续恶化。

为了培育更多优质的医疗资源、为了提高医生靠拿红包和吃回扣自我提高报酬的现象,医改的一个重要使命就应当是让医生能够通过体面的、有尊严的方式获得合理的报酬。

医改,不仅要考虑患者的利益,也要考虑医生和医院的利益,从本质上讲,患者和医生是一个共生关系,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改变“以药养医”,不能变成是“以国养医”,而一定是“以医养医”。不能把患者的负担变成国家的负担,而是要把过去在医疗环节存在的不合理费用挤出去,把“过度医疗”增加的成本减下来。

惟其如此,方能共赢。(相关报道见第四版)